自　　述

学不干时身更贵，
书期供用老弥勤。
——录公严师诗句

我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到目前已有五十六年了。但认真算起来，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放下笔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五年，我只写了几篇短文。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到一九七九年末平反，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才鼓起勇气记下当时的感受。我并不奢望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发表，只是为了排遣生活的空虚，想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一点痕迹。这期间我两次患病，一次在三年灾害时期，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一次在“文革”前两年，正是我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少年时期所患的静脉周围炎（眼底回血管出血症）复发了。一天早

上醒来，我的右眼一片黑暗，完全看不见了。我对这意外的打击感到恐惧。那时写作是我的惟一寄托，我不能想象眼睛完了我将怎么办。在这愁苦的日子里，我的亲人为我找到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我接受了医生直接在我眼球上的注射，每周一次，一共打了九针。由于疗效不大，剩下的一针就停止不打了。当我从消沉中渐渐振作起来，我还不能使用目力，只有请求父亲帮助。那时他已八十出头了，早已从北京交大退休回来，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他步行到我家，以极大耐心为我阅读资料、作口述笔录。现在我还保存着他为我誊写的八大本手稿。我的眼病刚刚有所好转，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发生了。

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黑格尔于一八一八年荣膺柏林大学的讲席，他一登上讲台就在开讲词中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使得几乎已经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发出它的呼声。”（大意）黑格尔说的使精神返回自身那种内心的宁静，不是生活在动荡环境中的人所能享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通过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大概神秘主义者雅科布·伯麦（Jakob Böhme）把“苦闷”（Qual）作为能动的本原

就含有这种意思吧。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宁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窘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所愿意的。相反，我们却要为命运所作的这种安排付出重大的代价。

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 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我以为不能单单列举五四时代那些把学术当成实现某种意图工具的学人，作为维持“救亡压启蒙”这一观点正确性的惟一依据。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思想本身去找寻问题的答案，纵使当时没有救亡的压力，他们也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一时期和他们不同的另一些人，如王国维、陈寅恪等，看作只是一些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冬烘学者，殊不知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并不比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逊色。他们以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宏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未始不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学术研究。

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

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道德理想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惟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候在家庭受到宣扬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

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练、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演讲录》三种成了我熟读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写了两次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

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含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赝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

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象难以破除的偏见。

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听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竟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文章,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做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

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涵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记于沪上清园

（录自《清园论学集》序）

寻 根 江 陵

九月二十三日

晴。按事先约定，今日偕清姐同去江陵。上午五时起床。六时乘小吴车去机场。七时二十分准时起飞。八时四十分抵武昌，庐音、嘉年及江陵萧旭副县长、刘耕伐局长来接。下榻珞珈山宾馆。下午三时去武大宿舍探望舅母许海兰。舅母已九十又三，仍健。她与舅父结婚后，来华已久，能说一口湖北话，但此次见面只用英语谈话，而头脑亦不如上次见面时清晰。舅母住庐音家中。我们去时，庐音与车锐、稀恩与秉兰、嘉年与王仁卉及第三代桂钢、车音及嘉年之女均在，济济一堂，十分热闹。第三代中除车音外，其他尚初次见面。我和他们都谈了话，直到九时始尽兴返珞珈山宾馆。

九月二十四日

晴。江陵开来两部小车供我们乘用。早上七时许起程，自汉

阳上高速公路,入荆州地区。经仙桃、潜山、丫角,其中有一处地名麦山（麦读若渣，裂开也。小时候家里人称布鞋裂开即云麦开）。高速公路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可惜只有中间一段，再前进仍转入普通公路。据云二年后高速公路可直达宜昌。抵江陵下榻县招待所。黄发恭县长、萧旭副县长等已在招待所迎候。中午萧副县长等设宴招待，晚则由余世先副书记招待晚餐。饭后，黄、吴县长来访。江陵乃祖辈生养之地。我在北京长大，从未到过祖籍，此次来到故土，不免思绪起伏，深夜仍难以入寐。甫入睡即醒转。前些时为撰写《杜集序》夜夜服安眠药未断。今夜睁眼躺在床上，又有蚊虫来扰，只得起床开空调以驱蚊。

九月二十五日

晴。早黄县长在会议室讲述江陵建设情况，萧、吴、余、刘诸位亦在座。闲谈中，有人说到江陵干部不会宣传，附近有些县在这方面比较擅长，所以江陵从未被评上模范县或先进县。但有一年闹饥荒，独江陵无粮荒，附近被称为先进县的乡民纷纷来到江陵就食。下午吴、余二位副县长陪同去江陵图书馆参观。门前“江陵图书馆”五个字为我所书写。我捐赠图书馆的书已近三千部，在馆内专辟一室存放。晚，武汉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李建中、荆州师专中文系白少玉及地方志编辑部一同志来访。

九月二十六日

晴。上午李家栋副书记偕经委陈主任陪同参观果糖浆厂、纺织厂、马河水厂等处。谈到荆州的纺织工业，想起母亲常夸荆州

缎如何精良，小时候我们家所用的被窝就是以荆州缎作为被面。母亲也常常讲起荆州妇女多在纺织厂做工，可见清末这一带纺织工业已很发达。马河水厂是江陵引为骄傲的地方。占地颇大，江陵人把水厂建成像一座园林，花草树木，琳琅满目。身入其境，不知这座花园中竟隐藏着一个自来水厂。午后，参观博物馆，博物馆是宫殿式建筑，覆盖着蓝色琉璃瓦屋顶、灰白色的西式房屋，颇像我小时在北京所见到的燕京大学的建筑格式。原来馆藏的吴王戈、越王剑已调京，没有见到。馆中有一具西汉出土的男尸，密封于地下用水泥制成的墓穴中，上覆以厚玻璃砖露出地面，可供人参观。据说尸身出土时尚有弹性，但因浸泡在红色药液中过久，毛发皆落。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具男尸比马王堆出土的那具女尸要早一百多年。博物馆中还有一项名贵的陈列品，也是极罕见的，这就是薄如蝉翼的丝织品残片，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现代纺织工艺已无法制成这样又轻又薄的丝绸。讲解员最后把我们引进博物馆的一个小礼堂去看楚乐表演。幕拉开后，台上穿着楚国服装的十来个演员分掌自己的乐器，编钟、凤鼓等等，一起演奏起来。我不懂音律，很难说出这些拟作的楚乐有多少成分保持了原来面目。楚乐奏罢，忽然演奏了一首外国歌曲 Long Long Ago。在这场合演奏一首洋歌，我实在感到有些惊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县领导，认为在楚乐中夹杂洋歌不妥。但博物馆归地区管，也许县里说不上话。

九月二十七日

晴。到江陵后我仍按平日习惯早起作户外散步。上午参观

八岭山墓葬群。先到了辽简王墓，地处荒山中，规模甚大。辽简王为明永乐弟,名朱植。墓地甬道直通停棺处,棺椁仍在,朱植大概在此地被封王，其历史不详，一时难寻史书核查。楚国建都于郢达四百余年，江陵即郢故地，名纪南城。在墓葬群不远有纪南城故址石碑，碑文为郭沫若书写。这个昔日的城廓，今已成为桑田。田野中隆起一道土坡，陪同者指给我们看说，这就是郢都城垣遗址。八岭山墓葬群建有高数层的木架瞭望台，登上眺望，大小坟墓连绵不绝，尽收眼底。陪同参观的萧副县长指着不远地方的一个直径约三四丈、上面长着青草的土丘说，这就是楚庄王之墓。据说有三十多个楚王埋葬在此，其中庄王墓最大，他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在他那时候也最强盛。此地既是楚国的陵园，地下埋藏的文物一定非常丰富。县里的领导曾向我说，发掘出来的楚国漆器几乎可堆积成山。他们曾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要求将多余漆器出口，换取外汇搞建设，但没有被批准。这么多出土的漆器由于无法好好保存，不少已在腐烂。中国的确是一个文物大国,地下埋藏极丰,掘地即可见宝。仅以出土的汉简而论,许多地方博物馆也像荆州博物馆一样，面临无法保存的困难。汉简如龟甲、钟鼎、帛书这些出土文物一样,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财富,可补文献之缺，可订史书之讹。由于各地博物馆多采取地方保护政策，不愿外人插手整理，而仅靠本身十分有限的力量，又无法做成。于是大批汉简堆放在那里(有的甚至是泥地上),任其慢慢腐烂。这真是中华文化的损失。听说，政府对地下发掘渐采保护政策，这在无可奈何中尚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因为埋在地下还不致腐烂。江陵县领导说，政府对于楚墓群也作出了同样暂不发掘的

决定。但还有一种隐患，也不得不防。最近听说国内盗墓者正纷纷南下，他们有优良的装备和技术，而墓葬群面积广阔，倘只派一两个警卫防范，恐怕无济于事，我把我的杞忧告诉了江陵县领导。上午参观毕，回招待所后，为索字者题词，书条幅二十余幅，倦甚。晚餐萧副县长作东，餐名“百饺宴”。回到住地，蒋经韬携妻女已等候多时，但时间太晚，稍坐即辞去。

九月二十八日

阴雨。早驱车出城门，在长堤行驶，长堤的一边，江水浩淼，甚为壮观。途经芦花荡，即三国故事中张飞拒周瑜处。京剧有一出戏名《芦花荡》，即以此为题材。但此地并无芦苇，与一般江岸无别。它是那样平凡，很难想象这里曾演出过这样一出热闹戏剧。小时听父亲说，家乡一带留下不少三国故事的遗迹，什么“张飞过河一拳一脚”，什么“咬草崖”等等。前者说的是张飞有急事要过江，受阻过不去，一怒之下，在一块巨石上打了一拳，留下一个比常人拳头大数倍的拳头凹痕，又踢了一脚，留下一个比常人脚大数倍的脚印。“咬草崖”也是一种传说，相传关云长一次骑着他那赤兔马，翻越一座十分险要的山岭，行至悬崖峭壁，无路可走，马只有咬着青草向上攀登。所以至今那里生长的草，还是没有草尖的。儿时听了这些带有传奇性的故事，真是不禁神往。可是我询问陪同参观的家乡人，他们已不知道这些故事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和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由于地域不同，形成了南北的差异。上述那些儿时听到的故事，就充分显示了南方的浪漫色彩，它们和北方的写实风格是截然异趣的。

我们一行离开了芦花荡，又到荆江分洪处略事逗留，再驱车前往沙市。沙市是被评定为全国四个卫生城市之一。这里确实给人以清洁、整齐、有序的印象。街道宽敞，房屋栉比鳞次，错落有致，不像有的城市那样凌乱、拥挤、嘈杂。以前我虽然从未到过这个城市，但听母亲的讲述，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的青春年华，她向我们谈到家乡的人情风物至今仍历历如绘。这里的民风淳厚，家乡菜又是那样美味可口。母亲经常向我们诉说的是，做牧师的外祖父和他的圣公会教堂，以及寄居他家的那些师爷们。外祖父的两个妹妹，一个嫁出去了，因丈夫不良而忍受着无限的折磨。另一个则是心肠柔软，极富同情心，往往倾自己所有，甚至不惜脱下陪嫁的手上金镯去周济穷人。她一见到别人受苦受难就忍不住流泪，以至终于哭瞎了双眼。还有邻居家的那个可怜的养女，每天天不亮就拎着饭篮，里面盛有粗粝的饭菜，摸黑赶到纺织厂去上班，她因害眼病，眼边一圈全烂了……这些故事在我们的幼小心灵里，曾激起了不少感情的波澜……现在已无法去追寻那些如梦的前尘往事了。

但我和清姐还是想去找寻外祖父的坟墓，抗战前母亲曾只身来到沙市，去外祖父坟上扫墓，还带回一张她在坟前十字架下拍摄的相片。母亲扫墓已是多年前的事了。桂家后代，已无人留在沙市，墓地恐怕是已影踪全无。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打消寻根的愿望，我们再向陪同者提出去寻觅外祖父传教的那座圣公会教堂。它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如今圣公会在中国不复存在，各派教会已成为三自爱国一个组织了。但我们在沙市终于还是找到了一座教堂，其中有几位年老的教友。可惜他们都说不知道光

绪年间沙市曾经有个圣公会的教堂。

我们从教堂出来，经过中山公园，公园的幽静很吸引人。我提出进去走走。那里有一个美丽的湖泊，游人稀少。我们没有想到在公园里竟然看到了楚国大夫孙叔敖的坟墓。孙叔敖也是我儿时从父母那里常常听到讲说的人物。据说他年轻时，在野外看见了一条双头蛇，相传看见双头蛇者不祥，孙叔敖为了不使别人再看到这条双头蛇，就把它打死了。这个故事很平凡，但我至今还记得。充斥在中国儿童生活中的诸如此类的大量民间故事，对他们一生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化传统往往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深入人的心灵，形成了他们的人格，甚至铸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回来略事休息，午后随萧旭副县长去参观碑苑、盆景苑、书画苑及荆州古城垣。由于参观的地方多，时间少，前面几处走马看花，匆匆一览而过。但荆州古城垣却得仔细观赏。这座古城以三国的传说最多。如‘刘备借荆州’‘关云长大意失荆州’等等。到了清代，荆州驻扎有满洲旗兵，把城区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满城。荆州是南方保持最完整的城垣。不过现在的荆州城是明代重新修建过的。我们从城垣马道走上城楼，围绕在城垣外面的护城河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似乎提醒我们，以前的荆州城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时间已晚，不能作过多的逗留。我们匆匆从城垣下来，赶到附近的张居正故居，希望也去看几眼。现在故居只留有外面临街的一小部分,里面已拆毁改建,成了居民住所。我们进去,见有一个妇女正在狭小的屋中洗涤衣物。从那里出来，已是日暮关山，夜晚开始降临大地了。

九月二十九日

晴。早上至江陵图书馆参加座谈会。这是按照我的意思安排的。来江陵前我提出几件事：不要惊动地区领导，不作专题报告，愿和图书馆读者以及江陵文化界人士接触，但人数不要太多。在座谈会上我作了简单的发言，接着读者提问。会后与荆州师专李德尧、刘汉民、白少玉副教授合影。李德尧在谈话中谈到我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和知性不能掌握美的观点，他对我的文章似乎很熟悉。谈话之后，荆州电视台来采访。

九月三十日

晴。早在楚风过早（家乡话称用早餐为过早）。这是陪同者应我和清姐的要求，特地选这家保持传统风味的小店来用早餐的。小时听说有一种“汽水粑粑”,我们很想尝尝是什么味道。一到楚风我们就叫了这种点心。等拿到我们面前，一看并不特别，吃起来也很平常。

七时半乘县里小车出发。由江陵至宜昌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尚未通车，汽车驶在即将废弃的旧公路上，颠簸难行是可以想见的。我们情愿吃这份苦，因为沿途有许多三国古迹。汽车首先开到玉泉寺停了下来。这里是三国故事中关公被害显灵喊着“还我头来”的地方。玉泉寺与普通寺庙无异。但庙外有几处珍珠泉，倚着石桥的栏杆可见一串一串细小如珠的泉水从下面涌出。汽车再往前行驶，抵达一个小镇，行人和各种车辆在并不宽敞的街道上熙来攘往,两旁商店很多,十分繁华。陪同者说,这就是赵子

龙鏖战曹兵、只身救阿斗的长坂坡。我们不能想象当年的长坂坡竟会是这样。这里除了在稠密市井的一小块空地上，高耸着一尊赵云戎装乘马的石刻雕像外，一点也看不到曾经作为古城的痕迹。那尊石刻雕像完全是照戏台上的赵云仿制的。雕像座下没有一点空隙，小贩在这里摆的摊子杂乱无章，紧紧挨着的是过往车辆的停车场。

中午十二时左右，我们的车到达宜昌。经过附近的三游洞时，由于长途跋涉，大家均感到困顿，希望早一点找个地方休息，都不想进去浏览了。宜昌是个大地方，街道宽阔，房屋整齐。解放后此地曾有作为省会的动议。进入市区后，由宜昌市接待办招待午餐。饭后又招待我们到附近一家宾馆休息。下午四时半上船。这是一艘在长江行驶的小轮船。可在船上观看三峡。我们准备在四川境内巫山下船，去浏览小三峡，一天后再由那里乘江轮折返。我还没有入过川，这次总算是进入四川境内。我们买的是三等舱，六人一间，恰巧我们一行六个人，在船舱内可以随意安排。船驶离宜昌码头，两岸没有什么风景可看，进入舱内聊天，天色渐渐暗下来。吃了带来的干粮，估计要到半夜才可驶过三峡,只有等回来时,再看三峡的风景了。上床不能成寐,服安眠药后，开始还听到轮机隆隆声，江水汩汩声，但不久眼睛渐渐蒙眬起来……

十月一日

晴。早上五时船靠码头。巫山是一个临江的小山城。下船上岸要爬上高达数丈的陡峭山坡。江南有很多这样的山城。记

得抗战初，我从温州到金华，由于公路被破坏，乘民船在瓯江溯江而上。船抵青田过夜。青田就是这样一座临江的小山城，同样建在半山腰，下船也是要爬上一段长长的石阶通道，半途还要经过一座用石块垒成的门洞。门洞上面，有一块空地，像座平台，坐在那里可以眺望四周的风景。这座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城，被气势宏伟的崇山峻岭所环抱，瓯江的清丽江水在下面平静舒缓地流着。太阳落山后，天空的晚霞渐渐转暗，巍峨的群山笼罩在一片绛紫色的暮霭中。青田的美丽令人陶醉。这是将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过去的巫山是否也像青田一样，曾经包围在那种纯朴无华的古老气氛中，现在我所看见的这座山城却正匆匆忙忙地准备向现代化大都市的模式挺进。它并不具备建成大都市的条件，所以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也许这也是一种在发展中的进步吧，不过令人感到若有所失，因为在这偏僻的山区，本来所具有的那种大自然的迷人魅力，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

我们在巫山找到一家旅馆，开好房间，把随身带来的简便行李撂在房内，就又赶到江边码头，去寻找浏览小三峡的游艇。江边麇集着十来艘游艇，在等候客人，每艘游艇可载二十几个游客。它们的外形虽然并不好看，但都装有马达，舱位也干净舒适，不仅周围有明亮的玻璃窗，连顶篷也可以随意打开，以便游人仰观上方的景色。人称小三峡胜于大三峡，这话不是虚谈。我们是先游览了小三峡，后来才游览大三峡的。相比之下，我对大三峡的兴趣就不那么浓厚了。小三峡有清澈见底的浅滩，也有江流湍急的险滩。到了险滩，游艇上的游客被喊下船，要走一段旱路。船上的马达关闭，几名水手撑船前进。小三峡最诱人的地方，还是